



李定一 著

中美早期外交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美早期外交史

李定一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早期外交史/李定一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9
ISBN 7-301-03070-3

I. 中… II. 李… III. 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784~1894
IV. D829.712

书 名: 中美早期外交史

著作责任者: 李定一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070-3/K·213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394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序 一

这本书与十八年前出版的《中美外交史》第一册，除掉改正了若干错误外，有四点主要的差别：第一，新增五章约二十余万言，超过原书三分之一；叙史断至1894年，较原书增加三十余年。第二，注释已尽可能排在正文同页，足以方便读者对史事之了解。第三，附有中英文参考书目，其中本书著者依赖深切之专著，均特别标明，读者自可进一步以之与本书参照阅读。

原序一字不易附于后，称“序二”，用以彰著者未能完成一项预定工作之罪过。至于半途而废之原因，不拟赘陈，因均不过文过饰非而已。

本书承传记文学社同仁、缪全吉教授及内子汉春等协助校阅，均志不忘；舛误之处仍由著者负责，敬祈指正。

李定一

1979年4月于台北市翠山寄庐

序 二

1950年春，著者阅及美国国务院所发布之白皮书：《1944--1949的中美外交》(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 Far Eastern Series 30, Aug. 1949)，颇有感触。同年夏(6月25日)，韩战爆发，有关之言论，一时蜂起，拜读之余，不免时有遐想。中美两大民族自开始接触及其如何发展之历史，实宜以较有系统之方式介绍于世人前之念，不禁油然而生。自是而后，于授课、鬻文之余，辄以博览有关著述，搜集各方材料为务，转瞬十载。于兹卷首，谨以下列诸事，敬告读者：

一、**内容** 按一般所称“外交史”即英文之“Diplomatic History”译称，似当称为“交涉史”，以其限于各国家政府间之交往谈判故也。本书则包括中美两国间之商务贸易、传教事业、文化交流、移民与乎交涉等事；即两民族间之个人、社团与政府间之交往，均在本书叙述范围内。或问何以不用“中美关系史”之名，“关系”，即英文“relations”；答以诚然，故本书之英文译名即为“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惟“relations”一词，此处应可译为“外交”，以其涵义广泛，不限于仅指各国政府间的“交涉”(diplomacy)之外交也。如“国民外交”一词中之“外交”似不可以“diplomacy”称之也。

二、**目的** 本书事属草创，其目的乃在抛砖引玉，至盼海内外读者谅之；其有疏忽与错误之处，亦祈不吝指正之。

本书之完成，有赖于各先进专家之著述者，实甚深切，不及一一

各举其名；当于第四册附录“参考书目录”，及“史籍史料简介”中叙述。至于中外图书馆所赐予之协助，亦不胜类举。其中如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图书馆、中国文学系图书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总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史丹福大学胡佛图书馆（The Hoover Institution of War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等，均承惠予极大之助力。尤以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及其汉和图书馆所予研究工作之方便，实铭感难忘，特志于此，用申谢意。内子汉春抄写校对之劳，亦一并志此。

铜梁李定一识于台湾省台北市 1961年5月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1)
第一章 中美关系之肇始(1784—1814)	(1)
第一节 美国始通中国之原因	(1)
第二节 中美贸易的开端	(6)
第三节 美国对华贸易激增的原因	(13)
第四节 中美通商对美国的影响	(23)
第五节 广州的美商	(31)
第二章 中美关系之展开(1815—1834)	(38)
第六节 中美贸易的变化	(38)
第七节 美国在华之传教事业	(43)
第八节 中美间的交涉	(51)
第九节 中国对美国的认识	(61)
第三章 美国与鸦片战争	(69)
第十节 美商与鸦片走私	(69)
第十一节 美国朝野对鸦片战争的反应	(78)
第十二节 加尼司令的东来	(84)
第十三节 顾盛使团的遣派	(92)
第四章 中美第一次条约的订立	(100)
第十四节 程喬采与顾盛	(100)
第十五节 顾盛的领事裁判权理论	(109)
第十六节 望厦村的谈判	(117)
第十七节 《望厦条约》	(124)
第五章 《望厦条约》后的一般发展	(142)
第十八节 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	(142)

第十九节	传教士与美国对华外交·····	(149)
第二十节	英美在上海的磨擦·····	(157)
第二十一节	美国在华商务及传教事业的展开·····	(167)
第六章	美国与中国内乱 ·····	(178)
第二十二节	马沙利的助清政策·····	(178)
第二十三节	麦莲放弃中立政策·····	(187)
第七章	修约问题之提出 ·····	(197)
第二十四节	麦莲对修约的尝试·····	(197)
第二十五节	伯驾修约的失败·····	(210)
第八章	伯驾个人的侵台政策 ·····	(218)
第二十六节	伯驾台湾政策的背景·····	(218)
第二十七节	伯驾幻梦的消逝·····	(227)
第九章	美国修约成功 ·····	(236)
第二十八节	英美谈判对华政策·····	(236)
第二十九节	《天津条约》的订立·····	(242)
第三十节	中美上海谈判·····	(260)
第十章	北京换约的齟齬 ·····	(272)
第三十一节	华若翰在北塘·····	(272)
第三十二节	华若翰使命的完成·····	(284)
第十一章	蒲安臣时代(1861—1867) ·····	(297)
第三十三节	蒲安臣与合作政策·····	(297)
第三十四节	合作政策之实行·····	(307)
第三十五节	美国与中国内乱·····	(320)
第十二章	蒲安臣使团(1868—1872) ·····	(341)
第三十六节	初使美国·····	(341)
第三十七节	蒲安臣的贡献·····	(351)
第三十八节	使团在欧洲·····	(360)
第十三章	中国人在美国 ·····	(370)

第三十九节	从欢迎到排斥·····	(370)
第四十节	清廷对海外侨民之政策·····	(382)
第四十一节	《安吉立条约》之签订·····	(397)
第四十二节	侨案——华侨被凌辱与屠杀·····	(406)
第四十三节	美国的根绝华人政策·····	(420)
第十四章	派幼童到美国 ·····	(438)
第四十四节	留学美国·····	(438)
第四十五节	留美与召回·····	(452)
第十五章	美国教会在中国 ·····	(463)
第四十六节	在华传教事业·····	(463)
第四十七节	教案·····	(477)
主要参考书目	·····	(488)

第一章 中美关系之肇始(1784—1814)

第一节 美国始通中国之原因

1783年9月3日英美签订《巴黎和约》，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经过长期(1776—1782)艰苦的战争与谈判，终于脱离英国的桎梏，正式独立。政治上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固然获得，但国内仍然困难重重；无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面临许多难题，亟待解决。在经济上，这个新诞生的国家，要想从一直赖以生存的大英帝国之世界经济体系中脱颖而出，独立发展，确非易事。为了寻求解决独立后所遭遇到的经济问题，若干美国人士立刻开始将他们的目光转注到那辽远的、神秘的、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西方——中国。

中美关系的肇始，完全由于独立后的美国对中国经济上之需要，因而主动地、积极地向中国扩张贸易。由于贸易的逐渐展开，其他林林总总，诸如传教、兴学、教案、移民、侨案(美人排华侨之案件)、留学以及国际交涉等等事项也相继发生。但中美关系肇始的那一段时期(1784—1814)，双方的关系却只限于商务贸易。

在美国离英独立以前，中美之间并无直接贸易关系。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所需要的茶叶，主要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船只自广州运到英国，再转运到北美。^①到十八世纪时，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茶叶需要的数量已经很巨大，不满意由伦敦运到

^① K. S.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p. 10.

茶叶的高价，多乐于购买由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走私的茶叶。^①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之一，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的骚动，即是英国政府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因为法、荷、丹、瑞等国的竞销茶叶而引起的破产危机所颁布之《茶叶法案》(Tea Act of 1773)所激起。^②

英国东印度公司除掉运中国茶叶到北美外，亦运北美土产到中国，其中以人参(ginseng)为主。^③自1718年始，即有北美人参输往中国。^④英国东印度公司“特派人到北美东北部新英格兰(New England)以金钱、威士忌酒、小饰物及烟草等为报酬，鼓励印地安人去找人参。”^⑤不过最初运北美人参到中国的，大约是以法国人为主。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记载中，最早关于人参输中国的时间是1750年，是年由法国运到广州四十担人参，英、丹、荷、瑞等国均无此项货物。^⑥此后再提到时，便是1784年美国直接以人参输华了。^⑦

独立战争期间，美人饱受英国海上封锁之苦。盖当殖民地时期，

①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 p. 295.

② R. V. Harlow, *The United States: From Wilderness to World Power*, p. 93; Mores, *op. cit.*, Vol. I, pp. 295-296, 按自1745年起，英国自广州所运出茶叶数量开始超过法国与荷兰。但到1763年“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 1757-1763)结束，法、荷、丹、瑞等国开始与英国竞争茶叶贸易，除掉向北美走私外，并向英国本土走私。1769-1772年，英国输入茶叶10619900磅，上述四国输入茶叶19902000磅，几乎超过英国一倍之多。自1773-1775年，英国输入茶叶为3149300磅，较前锐减，而四国则增为22528800磅。而1773年东印度公司库存竟达17000000磅之多。故颁“茶叶法案”，除加殖民地茶税每磅三便士外，并欲由东印度公司独占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茶叶输入。

③ T.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19th Century*, p. 6.

④ 耶稣会传教士 Joseph F. Lofitare 于1718年首先在巴黎发表加拿大发现人参之事。Latourette, *op. cit.*, p. 10.

⑤ W. Speer, *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Empi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410.

⑥ Mores, *op. cit.*, Vol. II, p. 292.

⑦ *Ibid.*, p. 95. 但 Latourette, *op. cit.*, p. 10. 注②中却引 D. MacPherson, *Annals of Commerce* 之言，称1770年美洲殖民输出人参74604磅，价值一千二百四十三磅八先令。

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产品类多依赖海外进口,若干日常生活必需品亦然。十八世纪的美国人已经是茶叶的大消费者。^① 对战时茶价之昂贵与匮乏,自然十分敏感,故《巴黎和约》一经签字,美国立即从事发展海外贸易,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中国的广州。

因为脱离大英帝国而产生的经济问题,固然是美国亟谋发展所谓“东印度贸易”(East India Trade)的主要原动力;但问题也并不如斯简单,尚有其他种种因素凑合一齐,使得美国人既愿意,也能够向中国贸易作一次极为冒险的尝试。

殖民地时期,美人的主要海外贸易地是英属西印度群岛(British West Indies),北美各州以木材、烟草等物运销西印度群岛,将所赚得的外汇,作为向西欧(主要是向英国)购买货物之用。独立之后,英国即禁止美商前往西印度群岛贸易,由是美国缺少向欧洲进口商品所必需的金钱。这对美国经济生活是一个极严重的威胁。^② 宜乎美国史学家邓莱迪(Tyler Dennett)要说:“一个没有工业的国家,僻处在不能生产各色生活必需品的地域内,再受到长期战争所带来的贫困,美国距经济自足之境实深遥远。第一批到亚洲去的美国人,实是被迫出此,他们必须去——去到任何地方。”^③

第二个因素,是由于独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为对抗英国海军封锁,而准许美人持“私掠默许状”(letters of marque)在海上劫掠敌船。许多海上冒险家因此暴富。由是美国人对于航海船舶制造技能与远洋航行的知识都一日千里,大大增加。也因此而使务农为主要的美国人对远渡重洋有了兴趣。这种海上的冒险精神,是美国人在独立后能够“去到任何地方”的主要原因。^④ 战争结束后,这批战时的海上英

① H. B. Morse, *op. cit.*, Vol. I, p. 295

② S. E. Moriso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 pp. 31-32, quoted from Latourette, *op. cit.*, p. 12.

③ Dennett, *op. cit.*, p. 6.

④ C. S. Osgood and H. M. Batchelder, *Historical Sketch of Salem*, p. 137.

雄——业余海盗的谋生顿成问题，他们必需另寻猎物。开拓对华贸易与到“西北海岸”(Northwest Coast)去探险^①，正适合这些人的胃口，同时也可以减少若干战后社会不安的因素。后来许多有名的船长，如发现哥伦比亚河(R. Columbia)的“哥伦比亚号”船长肯崔德(Capt. J. Kendrick)即是这一类的海上英雄之一。^②其实美国人的海上冒险精神，并不肇始于独立战争的私掠队，远在十七世纪末叶，自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以北迄于红海及印度洋一带，海盗横行。这些海盗自罗德岛州(Rhode Island)、麻沙屈塞州(Massachusetts)、纽约州、南北卡罗林纳州(Carolinas)等地获得供应，补充人员，并在这些地方挥霍他们的不义之财。^③战时的私掠船，不过使他们海盗行为的本身上，披上一层爱国的薄纱，显得合法而已。但无论如何，他们对中美贸易的开拓，确具有不可泯灭的功绩。

最后，促成美国向中国发展贸易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即是黎亚德(John Ledyard)。1784年“中国女皇号”(Empress of China)到广州以前，土生的美国人到过中国的，就史家所知，仅有二人：^④其一即黎亚德，另一人只知其出生于维基尼亚(Virginia)，姓戈尔(John Gore)而已。黎亚德与戈尔两人曾参加英国探险家库克(Capt. Cook)的最后一次太平洋探险航行；于1776年7月自伦敦出发，1781年返英。黎亚德返国后，就其见闻所及，奔走鼓吹美国应积极发展中国及“西北海岸”的贸易；他所叙述的事实，当时无人相信。数年后库克船长的《航海日志》(1787)发表，始证明所述属实。故名史家史巴克斯(Jared Sparks)特为黎亚德作了一本传记，因此我们对黎亚德

① Northwest Coast 一词系泛指今之加拿大西岸及美国华盛顿州、俄勒冈(Oregon)州及加利福利亚(California)州北部等太平洋沿岸地区而言。

② H. S. Lyman, *History of Oregon; The Growth of an American State*, Vol. II, p. 87. 沙伦埠(Salem)的“厄塞克斯学社”(Essex Institute)即藏有若干私掠者的航海日志。

③ G. S. Kimball, *The East India Trade of Providence*. p. 3.

④ Dennett, *op. cit.*, p. 4.

的生平知道颇多。^①

1782年黎亚德返美之时，英美已在巴黎开始谈判和约。^②许多美人都在为和平后的商务作打算。黎亚德告诉各地商人：他亲见在“西北海岸”用六便士所购得的海獭皮在广州价值美金一百元。所以他竭力鼓吹美人从事俄勒冈(Oregon)与广州间的贸易，以海獭皮去换取中国的茶与丝。无人相信他所述的奇迹。仅有曾经作过余年(1780—1781)革命时期财政监督官(Superintendent of Finance)的商人摩理士(Robert Morris)对他的经历颇有兴趣，愿意派船到广州，但仍不相信有关海獭皮的故事。黎亚德在美国得不到支持者，乃远走英法，在巴黎会见美国驻法公使叶斐逊(Thomas Jefferson)，叶斐逊与他讨论后，乃建议克拉寇(George Rogers Clark)将军作一次“自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到加利福尼亚的探险工作”。^③叶斐逊认为黎亚德“是一机敏而有学识之人，但不幸的是幻想太多”。^④黎亚德虽然资志而歿，但他对中美直接发生关系所作的催生工作，确令人难忘。尤其对于美国西部开拓的运动，更有不可泯灭的功绩。

在上述种种因素交互影响下，“中国女皇号”便于1784年8月到达中国广州黄埔，时为中国清高宗乾隆四十九年。^⑤

① 黎亚德系美国康涅提格州(Connecticut)人氏，于1772年达提摩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攻神学，后参加英国海军，随库克船长航行太平洋各地，并到过广州。1882年私离英国海军返美。在家乡小憩后，即赴各地游说，均不得志，1789年死。参阅J. Sparks, *The Life of John Ledyard*.

② 1782年4月12日，佛南克林(B. Franklin)开始与英使奥士瓦(R. Oswald)谈判。

③ R. G. Thwaites, *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8 Vols., Vol. I, p. 20.

④ P. L. Ford (edited),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IV, p. 447.

⑤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九，页七称：“美里奇……究其初至大清，则在乾隆四十八年。”误。

第二节 中美贸易的开端

1783年时,美国人普遍地讨论对华贸易事情。是年9月3日和约签订后,波士顿的商人立刻筹备开拓对华贸易,12月便遣一艘仅五十五吨的单桅船(sloop)“哈利提号”(Harriet)自波士顿运人参驶往中国。“哈利提号”行经好望角时,事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所悉,英人深忌美国参加对华贸易,乃以两倍重的熙春茶(绿茶之一种)与人参交换。船长祁勒迪(Hallet)贪其重利,遂自好望角折回,失掉了第一次在广州升上美国国旗的荣誉。^①

摩理士自与黎亚德谈论后,便着手筹划对华贸易。1783年11月27日,他写信告诉已被任命而人尚在欧洲的外交部长(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叶约翰(John Jay):“我正遣派一些船到中国,其目的在鼓励他人从事对华贸易。”^②其时他正与以巴克顿公司(Daniel Parker & Co.)为首的一群纽约商人合作遣派“中国女皇号”到广州。

“中国女皇号”于1784年2月22日离纽约,持有国会所颁发的“航海护照”(sealetter)。^③船长耿若瀚(John Green)大约是独立战争的私掠者之一。^④经理(supercargo)^⑤萧善明(Major Samuel Shaw)曾受过相当教育,于独立战争中官至炮兵少校,^⑥后任美国第一任驻

① Morison, op. cit., p. 44.

② H. P. Johnston, The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 Vol. III, p. 97.

③ 在战争时,中立国船只由各该国政府发给此项执照,载明该船所属国家,所载货物类别,船长及船主姓名与自何处到何处等。此时美国颁发此项文件,有证明船只性质之意。

④ Dennett, op. cit., p. 7.

⑤ 按 supercargo 通译为“货物管理员”。美国对华贸易初期并无大公司组织,除航海事由船长负责外,其他均 supercargo 负责,其职权重大,并不类似一般之 supercargo 仅仅管理船上货物而已,故译为经理。Morison, op. cit., p. 45.

⑥ J. Quincy (edited), The Journals of Major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 中附有萧善明传略。萧善明歿于1794年自中国返美途中。

广州领事。“中国女皇号”于同年8月23日到澳门,28日到广州。^①运入货物计棉花361担,铅476担,胡椒26担,羽纱1270匹,皮货2600件,人参473担。同年12月27日离广州驶返纽约,运回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磁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②1785年5月12日抵达纽约。全程历时十五个月。

“中国女皇号”此次远航,共投资120000美元,获纯利37727美元,^③利润高达百分之二十五。这项消息,不胫而走,各大城市报纸亦长篇巨幅竞相刊登此次远航的经过。波士顿立即发行每股三百美元的股票,以便任何人均可投资。^④美国政府及国会也非常重视这次远航成功的意义。萧善明将其远航的经过报告外交部长叶约翰,外交部将之转交国会。报告中除叙述航行经过外,并称:^⑤

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最初他们尚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间的差别,视我们为“新人”(new people)。当我们将美国地图示之,并告以疆域人口的情形后,他们对今后土产出口可能大量增加之事,感觉十分高兴。

国会对之大为嘉助。有人写信给议员麦地逊(James Madison 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认为对中国贸易,实大有前途,因为运回之货物,不仅可供本国消耗,而且可将之走私西印度群岛;故建议所有

① 这两个日期,各家所载不同;Morse, op. cit., Vol. II, p. 5 称“中国女皇号”于1784年8月25日到澳门;Morison, op. cit., p. 45 称系8月23日到澳门;John W.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p. 27 云“中国女皇号”于8月30日到广州;Foster Rhea Dulles, 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 p. 1 则谓其到广州之日期为八月二十八日;但均未注明根据;Dennett op. cit., p. 44, 称其8月23日到澳门,但未提“中国女皇号”到广州之日期;Latourette, op. cit, p. 14 称到广州为8月28日。本书采8月23日到澳门之说,按之当时中外通商及交通情形,暂采 Latourette 8月28日到广州之记载。

② Morse, op. cit., Vol. II, p. 95.

③ 包括购买三百六十吨的“中国女皇号”等费在内。Dennett, op. cit., p. 7.

④ Latourette, op. cit., p. 15.

⑤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1783-1789, Vol. III, p. 761, 亦见 Journals of Major Shaw, Appendix p. 337.

美船自东亚运回美国之货物；均宜免税。^①联邦政府于1789年及1791年立法特别保护对华贸易。

自1785年5月“中国女皇号”返抵纽约后，美国大西洋沿岸各大商埠，因为对华贸易获利甚厚之故，竞相参加，一时竟有“中国热”(China fever)之称。^②

从事对华贸易的商埠很多，费城(Philadelphia)因为资本充足，曾经有一个时期的对华贸易额占首位；沙伦埠(Salem)与波士顿以船主多著名，但纽约仍为各地对华贸易之投资及交易中心。^③到1789年，美国已有十五艘船与中国贸易，1790年时，估计全美国进口货物中，来自中国者占七分之一。^④其发展之迅速，可谓惊人。

就开始四、五年间中美贸易发展的情形而言，中美贸易的前途似乎应该非常乐观。但实际上却不尽然。第一，美国能够输入中国的货物种类不多，数量亦有限。因为人参这类货品，美商既难有效控制产量，而价格也极不稳定。例如1786年“大土耳其号”(Grand Turk)的人参，每磅仅以六角六分西币售出，而“中国女皇号”的人参每磅约值一元八角西币，相差几达三倍之多。^⑤第二，美国的消耗量有限，中国货的市场也很快就达到饱和点。按当时美国人口不足四百万，^⑥茶叶、丝织品等中国货的消费自有其一定限度；转口或走私中国货仅是幻想，因为欧洲国家对华贸易较美国更有基础；中美直接贸易后，欧洲各国已经失掉了转口中国货到美国的机会，那能再容许美国去染指她们本国或其殖民地的市场！因此之故，在美国民间有了“中国热”之后，美国政府尽管也尽力保护对华贸易，但其发展亦适度而止。

① Madison Papers, Vol. 14; Grayson to Madison, May 28, 1785.

② Latourette, op. cit., p. 17.

③ Morse, op. cit., Vol. II, p. 173.

④ F. R.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pp. 210-211. 记载到1844年为止之统计数字。

⑤ Dennett, op. cit., p. 9; Morse, op. cit., Vol. II, p. 95.

⑥ S. E. Morison and H. S. Commager,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Vol. II, p. 899.